

# 蒙古历藏历汉历例说

黄明信<sup>1</sup>，申晓亭<sup>2</sup>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 北京 100081)

**摘要：**蒙古历、藏历、汉历三者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关系，这里以几个具体问题为例，谈及蒙古历、藏历、汉历、印度时轮历的某些原理、方法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与关系，本文分五部分论述：1、纪年法：(a) 对于蒙古文的《蒙古源流》成书年代的记载，田清波(Antome Mstart)理解为是作者诞生后的第59年(1662年)。我们认为田清波忽略了其中“愤怒”一词的性别，阳性愤怒应该理解为时轮历的“胜生周”的第59年，相当于公元1685年。(b) 《蒙古源流》里关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生年的记载“自前戊子纪年以来历2750年岁次丁丑”，我们认为这个“戊子”是藏传佛教萨迦派认定的以佛圆寂于公元前2134年丁亥为零年的次年“戊子”，可知这个丁丑相当于公元617年。2、纪月法：藏历每年历书的第一个月为什么都不是正月，而是霍尔月(蒙古月)三月？本文指出这是因为时轮历是以春分为岁首，时轮历创建时春分所在之月相当于霍尔月三月。同时讨论了霍尔月的特点、其命名的由来及其与汉历、时轮历的关系。3、纪日法：蒙古文的《俺答汗传》内有两处关于日期的动物属相的记载，与汉历日期的地支不合，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它们是按照时轮历的太阴日排列的。4、时宪历的引进。11世纪藏族就引进了印度的时轮历，但是直到18世纪才经过蒙古文的译本，把根源于16世纪欧洲天文学水平的“时宪历”转译成藏文，并经过北京雍和宫的一位蒙古喇嘛把它加以简化，用藏文记录下来，成为现存的藏传时宪历。5、汉、藏、蒙历法源流探索点滴。早期的藏历和蒙古历可能受到突厥历的影响，未采用干支纪年法，只吸收了十二生肖纪年法，但是，突厥的十二生肖纪年法也是由汉地传去的。同时春夏秋冬四季纪月法也是来自汉历。

**关键词：**蒙古历；藏历；汉历；论述

**中图分类号：**K892.3

**文献标识码：**A

蒙古历、藏历、汉历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关系。藏历是藏族的物候历、印度的时轮历、汉历的混合体，它以时轮历为主，以汉历为辅，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汉历又称夏历、农历、时宪历，其内容除天文历法之外，也包括五行占算。藏历与汉历同是阴阳合历，但是在纪年法、纪月法、纪日法、日月食的推算上都有许多不同。蒙古历有自己的传统，又兼有藏历、汉历的一些成分，并在汉历向藏历传播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里取几个与蒙古历有关的例子，论及某些原理和方法，从中可见三者之关系。

## 一、纪年法

(一)《蒙古源流》有关成书年代的记录，这里涉及到时轮历胜生周纪年法。

蒙古文的原文为：urjumal törögsen jil yisün ulayan killing-tü kemekü-yin tabin yisüdüger。逐字对译是：“生长物出生的年，叫做九紫愤怒明王的第五十九年”。

此书有清初的汉文译本，将这句意译为“乙丑九宫值年”，即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其后近二百年都沿用此说。到1956年比利时人田清波(Antome Mostaert)认为这句话应理解为“(作者)出生的第五十九年”，而原书的作者生于1604年，因此这个成书年代不是1685年，而应为1662年。此说出现后很快地得到各国学者的承认，内蒙古自治区于1962年举行了《蒙古源流》成书三百周年的纪念会，就是根据此说。现在国际上都采用其说，似乎已成定论。至于“九紫愤怒明王”，田氏未做解释。

我们理解，“九紫”是汉族历法(藏历同)里的“九宫”里的第九宫的名称，“愤怒明王”则是

指藏传时轮历的“饶迥（胜生周）”的第五十九年的名字，这里所说的不是作者出生的第 59 年，而是“饶迥（胜生周）”的第 59 年，应为 1685 年。

所谓“饶迥（胜生周）”是从印度传入西藏的时轮历的纪年法，它也是六十年一周期，每一年各有一个名称，就像汉历里用“甲子”作为六十年周期的名称一样，也是用其第一年的名称作为这种六十年周期的总称。这个第一年名叫 *rab-vbyung*，音译为“饶迥”，意译为“胜生年”，相当于丁卯年，因此也可以叫做“丁卯周”。不过，这六十个年的名称互不关联，不便于记忆，所以用之者较少。在藏历里更多是用第几个“丁卯周”（饶迥）与汉族的“甲子周”（又称干支周）相结合的办法。例如：公元 1984 年甲子记为第 16 个丁卯周的第 58 年木鼠年，2004 年甲申记为第 17 个丁卯周的第 18 年木猴年。在藏历里是用木火土金水五行各分阴阳来表示十天干。

蒙古历在纪年上多采用汉历的甲子周，蒙古用蓝红黄白黑五色各分深浅来表示十天干，同时也兼用时轮历胜生周纪年法。现将此例中有关的胜生周名称记录如下：

年序	梵文名	藏文名	蒙文名	汉文名
1	prabdava	rab- byung	sayitur-yaruysan	胜生、饶迥
38	khrodhini	khro-mo	kilingtei	愤怒母（阴性）
59	krodhana	khro-bo	kiling-tü	愤怒明王（阳性）

梵文、藏文、蒙文的“愤怒”都有阳性、阴性之别，时轮历的阳性愤怒年是胜生周的第五十九年，译为愤怒明王。而（第 11 个）胜生周的第 59 年正是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清初译本与之相符。而作者出生后的第五十九年（1662）是胜生周的第三十八年，该年的名称为阴性愤怒，译为愤怒母。不知这里是否是田清波的疏忽。

（二）《蒙古源流》里关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生年的记录。这里涉及到藏历里的释迦纪年法。蒙古文原文为：

tegün-ü köbegen-inü mön uridu tere uu quluyan-a jil-eče inaysi qoyar miny-a doloyan jayu tabin-uding üker jil eke samri tudger kemekü qatun-ača...

译成汉文是：“其子自前戊子纪年以来，历二千七百五十年，岁次丁丑，乃母必哩玛托特噶尔（藏文 *vbri-ma-thod-dkar*）夫人生一瑞相全备，顶显阿弥陀佛相，美貌灵异之子（按：即与唐朝文成公主结缡之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这个“前戊子纪年”和这个“丁丑”，分别各是哪一年呢？

佛教的史书常用释迦牟尼诞生或入灭（即圆寂）为纪元，但是这两个年代具体的究竟是哪一年？异说甚多，藏传的就十几种，其中最著名的有四种：

- 1、萨迦派的说法，佛圆寂于公元前 2134 年丁亥；
  - 2、《旃檀瑞像记》的说法，佛诞生于公元前 1027 年甲寅，实际上来源于汉文的佛教史书；
  - 3、时轮历浦派的说法，佛诞生于公元前 961 年庚申，佛圆寂于公元前 881 年庚辰，其后的著作采用此说者较多；
  - 4、迦湿弥罗班禅的说法，佛圆寂于公元前 544 年丁巳；
- 这些都与现在国际上最普遍的公元前 554 年之说不同。

因此，引用藏文和蒙古文史书，凡是遇到佛诞或佛灭纪元，首先必须知道作者所用的是哪一种说法。

上述的这个“戊子年”乃是按照萨迦派的说法，释迦牟尼圆寂于公元前 2134 年，以此作为零年，以其次年，即公元前 2133 年戊子为起点进行计算。2750-2133=617（公元）丁丑。即：松赞干布诞生于公元 617 年的那个丁丑年。与藏文的《布顿佛教史》《红史》《汉藏史集》所载正相符合。（此

三书都有汉译本)。

但不是所有的藏文史书都采用萨迦派的说法，例如五世达赖的名著《西藏王臣记》则采用浦派的说法是根据十五世纪的时轮历浦派名著《白莲亲传》(pad-dkar-zhal-lung) 中所说释迦成道在氏宿月，当时有月食的记载，用历算的逆推法推算出来的。而《西藏王臣记》的郭和卿汉文译本(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 8-10 页)却错误地把佛入灭推算成公元前 541 年，就是因为不知道原作者采用的是哪种说法之故。

这种释迦纪年法在蒙古史书中也经常见到。

## 二、纪月法

在 1994 年西藏自治区天文星算研究所所编的《第 17 丁卯周木狗年(1994) 历书》中：第一个月记录为“hor-zla-gsum-pa(霍尔月第三)”，最后一个月记录为“hor-zla-gñis-pa(霍尔月第二)”。其实，1994 年以前，历年的西藏历书都是如此记录的。“hor”音译为“胡”或“霍尔”，这个词在各个时代所指不同，在这里是指蒙古，因此可译为“霍尔月”或“蒙古月”。什么是霍尔月？它和藏历、汉历的关系又是如何？为什么在西藏历书中的第一个月要记录为“霍尔月第三”呢？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先看看时轮历系统纪月法的特点。

时轮历系统的纪月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二十七宿的名字作为月份的名称。

现在汉族习惯于以一、二、三等序数称呼月份，好像很自然，别无他法，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只能是样似的。其实不然。英文里十二个月份的名称，并不都有数字顺序的意义；印度古代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月亮最圆，即“望”的时刻，在二十七宿(代表天穹的恒星背景)中处于哪一宿、或其附近而命名，叫做“望宿月”。例如：望(即满月、月最圆的时刻)在角宿或其附近的那个月叫做“角宿月”，相当于农历的二月十六到三月十五日。氏宿月相当于农历的三月十六到四月十五日。以下依次为：心宿月、箕宿月、牛宿月、室宿月、娄宿月、昴宿月、觜宿月、鬼宿月、至星宿月，相当于农历的十二月十六到正月十五。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不必因不同的历法年首不同而变更其名称。因为它有客观的天文学上的标志，不是人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而任意规定的。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哪个教派都不能不承认它。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说：“随其星建，以标月名，古今不易，诸部无讹。”这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方法现在西藏仍在使用，它的使用历史要比霍尔月的使用历史长。

(二)以春分作为岁首。

一年的十二个月本来是循环不断，无所谓首尾的。但是为了天文计算和日常生活的方便，不能不给它定出个头尾来。至于把起点定在哪里，则由人自己选择，没有绝对的客观标准。这个起点，又有岁首和年首之分。岁首用于天文计算，一般都是采用一个在天文上有特殊意义的位置为起点。时轮历是采用昼夜相等的春分为起点。西藏《历书》遵循时轮历，以春分作为计算起点，同时又采用汉历夏历中以寅月为正月的“霍尔月”纪月法。时轮历开始制订时，春分所在之月相当于霍尔月三月，所以现在的藏文历书里仍保留旧的传统，把霍尔月三月放在历书的开头处。

(三)朔望月的起始。

朔望月是 29.53 天，不是整三十天。印度时轮历将从“朔”到“望”的时间称为“白分”，从“望”到“朔”的时间称为“黑分”，并且一个月的起始又有白分在前和黑分在前两种计算方法。印度时轮历的“望宿月”是以黑分在前计算的，即以月圆的望为月终日，以月圆的次日为月首日，又称“望终月”，例如：角宿月相当于农历二月十六到三月十五。藏传时轮历一般采取白分在前的计算方法，但固定月圆“望”为十五日，于是“朔”日就不能固定为初一。这与汉历又有所不同，汉历则是固定“朔”(即看不见月亮的那一天)为初一，因此“望”就不一定是十五，俗语有“十五不圆十六圆”，就是这个原因。

(四) 有不同于汉历的重日、缺日大小月计算法和闰月计算法。

在大小月、闰月的计算上时轮历与汉历的计算原理、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汉历求月的大小以朔（日月在同一经度上）为准，朔固定为初一日，以前一个月的朔与后一个月的朔相比较，日的天干相同者前月大，不同者前月小。时轮历里月的大小是用重日和缺日决定的，重日、缺日的原理是为调节太阳日与太阴日的日序关系而设置的，重日和缺日的有无和多少，决定该月是三十天还是二十九天，即月的大小。

	重一	重二	无重
缺一	三十天	不可能	廿九天
缺二	廿九天	三十天	不可能
无缺	不可能	不可能	吉祥月

又例如：时轮历和汉历虽然都采用了“无中气置闰”的置闰月原则，但时轮历用“平气”，一年十二个月置闰的机会是均等的，而时宪历用“定气”，十二个月里置闰的机会不是均等的，因此两种历法的闰月也是不同的。

那么霍尔月又有哪些特点呢？

(一) 以正、二、三等序数纪月。

如上所述，以序数纪月可以说是汉历特有的方法，藏历里是在十三世纪才开始使用霍尔月的正月、二月、三月……，这种以序数纪月的方法，称之为“霍尔月”。

(二) 以“寅月”为正月。

正月初一，是过年的日子，也是年首。以“寅月”为正月，这正是汉历中的“夏正”的纪月法。汉历是以日影最短，即昼最短、夜最长的冬至为计算起点的，冬至所在之月固定为子月（十二地支之首）。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商朝以其后的丑月为正月，夏朝以再其后的寅月为正月，这就是汉历中的所谓“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现在的汉历沿用的是“夏正”，即以冬至后的第二个月“寅”月为正月。霍尔月即是以“寅月”为正月，藏历的新年不在霍尔月的三月，而在霍尔月的正月初一。

(三) 固定“望”为十五日。

霍尔月采用从“朔”到“望”的“白分”在前计算法，与时轮历以月圆的次日为一个月的开始不同。但霍尔月固定“望”为十五日，与藏传时轮历相同，又与汉历固定“朔”为初一不同。因此霍尔月的日期和农历的日期有时重合，有时差一天，有时差一个月，有时差一个月零一天，差一天是因为认定初一、十五的方法不同，差一个月是因为置闰方法不同。

(四) 藏历中的霍尔月在计算闰月、决定大小月的重日、缺日上仍保持了时轮历传统的算法。

不难看出，霍尔月的前二条的特点都是来自汉历中的“夏正”，这种纪月法是在元代通过蒙古传到西藏的，并被藏历所接受，所以历史上称它为“霍尔月”（“胡月”、“蒙古月”）。而后二条中有时轮历的特点，这种兼有时轮历和汉历两种成分的方法也是藏历特有的方法，从1995年起西藏的历书中已改称其为“bod-zla (藏月)”。在藏文文献中仅出现过“霍尔月”这个名称，没有出现过“霍尔年”、“霍尔日”这样的名称。

上述例子的具体换算如下：第17丁卯周末狗年霍尔月三月初一 = 农历甲戌年三月初一 = 公历1994年4月11日。

关于霍尔月这个名称的来源，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黑白算答问》一书中说：“成吉思汗于第四个丁卯周的火猪年（1227）取西夏国都，隆重庆功，即以此月为蒙古岁首，星宿月遂以正月见称。”此书上距成吉思汗四百余年，达赖没有说出其根据，也许只是口头的传述。不过，藏族学者都沿用

此说。近年山口瑞凤先生对此提出疑问说：“据元史本纪，成吉思汗灭西夏是在元太祖二十二年六月，而不是在正月，这种传说是怎样形成的，无法猜测。”无论其确切的年代为何年，最迟到十三世纪中叶，在八思巴用藏文写的著作中已经在用时轮历的纪月方式（望宿月）之间夹有这种新的纪月方式。也叫做“王制月”，可能与汉族传统把“奉正朔”作为承认皇帝宗主权的标志有关。霍尔月的引进也是经过抵制和斗争的。布顿大师（1290-1365）比八思巴晚大约六十年，他还在指责八思巴，说他不应该穿蒙古服装，尤其是在传戒仪式中，述僧腊（即僧龄）时不该口称“霍尔月某日”。不过，后来这种纪月法还是被普遍地接受了。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往往是有一个过程的。

### 三、纪日法

蒙文《俺答汗传》内有两处关于日期的记录涉及到时轮历的纪日法。

#### 1、第4页蒙古文原文:

bodisong altan qayan yal qutuγ-tu em-e taulai jil-un budaday-a kökeler sara-yin yučin-a üker edür-tür butun qatun-ača niyun öken qoyar tegüs törögsen-dür...

汉文译文：“火吉祥母兔年(丁卯) 十二月三十日牛日圣者阿勒坦汗生于博坦哈屯”

#### 2、第37页蒙古文原文:

čayan moyai jil-dur qatun-u gool-dur kökeler sara-yin arban yisün-e bars edür-tur qan ejen dalan tabun nasun-tur-iyar taqiy-a čay-tur yaiqamsiy burqan-u sayudal-iyar sayuju tegri-yin yajar-a ögede boluysan čay-tur...

汉文译文：“白蛇年（辛巳）库胡列儿月（十二月）十九日虎日鸡时，在哈敦郭勒河（黄河）畔，君主可汗年七十五岁，结跏趺坐而升天。”

这里面有三点疑问：

- 1、这个丁卯年是明朝的正德二年，这一年汉历十二月小，没有三十日，是否藏历？
- 2、明正德二年最后一天的干支应该是戊戌，是狗日而不是牛日，怎样解释？

有一位日本学者猜想这个三十日是二十日之误，因为这个月的二十日才是牛日，而蒙文的二十与三十字形相近。（森川哲雄：《study of the biography of Altan Kan》九州大学教养部，1987，114页注[24]。）

3、这个辛巳年是明万历九年，汉历这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干支是己酉，是鸡日而不是虎日，怎样解释？

藏历中也有用十二属肖纪日的方法，但不同于汉历的六十干支纪日法。这种方法是每月初一固定为虎日或猴日，单月为虎日，双月为猴日，也就是说每两个月循环一次。以正、二两个月为例，列表如下：

虎	正月初一	十三日	廿五日	初七日	十九日
兔	初二日	十四日	廿六日	初八日	二十日
龙	初三日	十五日	廿七日	初九日	廿一日
蛇	初四日	十六日	廿八日	初十日	廿二日
马	初五日	十七日	廿九日	十一日	廿三日
羊	初六日	十八日	三十日	十二日	廿四日

猴	初七日	十九日	二月	十三日	廿五日
鸡	初八日	二十日	初二日	十四日	廿六日
狗	初九日	廿一日	初三日	十五日	廿七日
猪	初十日	廿二日	初四日	十六日	廿八日
鼠	十一日	廿三日	初五日	十七日	廿九日
牛	十二日	廿四日	初六日	十八日	三十日

这是正、二两个月的排法，三、四两月再循环一次，以下类推，即每年循环六次。无论哪一年都是这样。那么，遇到二十九天的月份，是否顺推呢？不是的，这种算法是以“太阴日”为前提的。太阴日每月固定为整三十天，没有大小月之别。但是把这种算法与太阳日的日期配合时，随着太阳日的重缺、有无，就会出现不连续的情况，起不到汉历的干支纪日那样的作用了。

有了这个表，上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十二月是双数月，其十九日正是虎日，其三十日正是牛日，《俺答汗传》这里的记录用的是藏历的重缺日纪日法，与汉历的干支纪日没有关系，因此，那位日本学者的猜想是不必要的。

#### 四、时宪历的引进

检测一种历法准确程度最重要的标志归根到底还是日食、月食的预测推算。汉族历来认为日月食是凶兆，印度的佛经里与此相反。西藏于十一世纪初从印度引进时轮历，其主要目的乃是因为佛经里说：月食时善恶作用增长七俱胝（千万）倍，日食时增长十万俱胝倍。因此，时轮历的信徒十分注重日月食的预测。但是按时轮历推算日食本来就不十分精密，更由于尾数的细小误差经过多年的积累，成为较大的误差，非常需要找寻一种更准确的方法。但是藏族直到十八世纪以前，没有从汉族引进更先进、更准确的历法。其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汉族皇家严格禁止历法外传，二是时轮历在宗教上有崇高的地位。

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十六世纪的天文历算。这时欧洲已经有了望远镜等观测手段，其成就超过十三世纪授时历的水平。于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批中国学者向他们学习，1635年制定出新的历法一百三十七卷，取名《崇祯历书》，已经刻板，由于政治动乱，没有来得及颁行，明朝就灭亡了。顺治元年（1644）清朝建立，曾经参加《崇祯历书》编写工作的意大利传教士汤若望，把这部书稍加删改压缩成一百零三卷献给清廷，取名《西洋新法历书》（后因避乾隆名讳，改名《新法算书》），清廷果断采用，顺治二年（1645）颁行，并且给它定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时宪历”。根据“时宪历”所编的历书叫做“时宪书”，民间简称为“宪书”，后来宪书几乎成为历书的同义语。有蒙文和满文的译本。时宪历沿用到1911年，改用公历后被称为农历，与公历并行。

藏历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吸收了一些汉历的内容，如十二生肖纪年法、霍尔月、二十四节气和春牛经等，但都是枝节的，不成体系的。有系统地汉历引进的历法只有一种，这就是从北京引进的时宪历，其中蒙古又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时宪历颁行后，以《新法算书》为主要蓝本，于康熙五十年（1711）便完成了时宪历的蒙译工作，我们称之为《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三十八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派人“携此蒙文译本送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请其译为藏文”。《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译本》是一部忠实于原著的选译本，只选译了其中推算时用到的实践部分，而省略了原理部分。可惜译笔生硬晦涩，加之当时的藏族的历算家们缺乏几何三角的数学知识基础，因此无法使用此书。

不久（乾隆初年，公元1740年左右），有一位雍和宫的蒙古喇嘛（很可惜他的名字没有留下来）为了蒙藏人易于接受，把它进行简化改编，创造出的一套与时轮历的运算方法揉合起来的方法，随即

有人用藏文写下来，题为“汉历中以北京地区为主之日月食推算法”，通称为《马扬寺汉历心要》。从此《马扬寺汉历心要》就成为藏传时宪历的祖本。公元1860年左右《汉历心要》从甘肃北部的马扬寺传到甘肃南部的拉卜楞寺，1879年建立喜金刚院传习这种汉历，每年自己编制“黄历”，直到1958年，八十年间没有中断过。二十世纪初年传到了拉萨，在藏医院里设立了传习课程，并将按这种方法推算日月食的结果载入每年编制的藏文年历里，至今保持不断，也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了。

时宪历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属于十六世纪末欧洲的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系统，已经进入近代天文学的领域，其推算日月食的结果是相当精确的，误差不过几分钟。但是经过简化之后的藏传时宪历就没有那么精确了，误差可达十几——三十几分。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蒙古历，在推算日食月食上用的方法与藏传时宪历是相同的。

## 五、汉、藏、蒙历法源流探索点滴

研究汉、藏、蒙历法可以发现，十二生肖纪年法及春夏秋冬四季纪月法在早期的汉历、藏历、蒙古历中都有应用，在现有的文献中，汉历中可以追溯到汉代，藏历可追溯到敦煌，蒙古历可追溯到蒙古汗国。那么，其中的源流关系又如何呢？这里先讨论两个问题：

### （一）十二生肖起源于什么地方？

“从多方面情况来看，十二生肖应当起源于中国，其理由具体如下：

其一：在东汉王充的著作《论衡》中对十二生肖便有较为系统的明确记载。从他在《物势篇》，《言毒篇》，《讥日篇》中的记载可知，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的概念在东汉已相当清楚。

其二：在《周书》卷十一《晋荡公护传》中，对生肖属相已有详细说明。如：“昔在武川镇生当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

其三：据考古出土资料《日书》可知，秦代已大体将十二地支与十二兽相联系。（尽管当时的十二兽与后来的十二兽有所不同）

其四：在先秦的古籍中，如《诗经·小雅·吉日》，《礼记》卷十七《月令》，《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也有一些记载，但是否为十二生肖纪年，目前尚有争议。

从以上事例来看，春秋战国之前甚至周代已存在十二兽即十二生肖。这说明十二兽在中国已有久远的历史，同时也说明十二兽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发明的，而不是从西方或其它什么地方传入的，其起源地当是中国中原地区。”<sup>①</sup>

这里，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竹简《日书》，在占卜盗者相貌特征时系统地记载了十二生肖，填补了汉以前资料不系统的缺陷。据考证，睡虎地十一号墓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因此十二生肖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秦以前。这样，赵翼因“更推知汉以前，则未有言及者”，而推论十二生肖源于匈奴，就显得过时了。

### （二）关于西方传入说。

“关于十二生肖起源的时间和地点，众说纷纭。清人赵翼最早提出它是由西方诸国，经西域由突厥民族传入中国的，他的主要根据是《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黠戛斯传》和《太平寰宇记》。据上述资料记载，西方的回鹘和黠戛斯人也是用十二生肖纪年。许多历法学家都不能提出足够的证据反驳他的这种看法，但只要仔细推究，其中的漏洞也就不难发现了。

《新唐书》和《太平寰宇记》所记回鹘和黠戛斯人以十二生肖纪年，当是在前745年以后，因回鹘人是在前745年灭亡突厥汗国之后建立回鹘汗国的，而黠戛斯人则是在公元840年攻破回鹘汗国后而建立黠戛斯国，他们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当是直接继承被其灭亡的突厥汗国。据大量史料记载，古代突厥各民族的十二生肖纪年法不是西方而是由中国传入的。其原因具体如下：

- 1、突厥各族在隋之前无法，其十二生肖纪年法是隋代由中原传入的；
- 2、突厥人于8世纪30年代才有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明确记载；
- 3、回鹘时代才较为普通地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

4、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有关于十二生肖纪年法及其来源的记载，原句如下：“突厥人取十二种动物之名称来记年”。

据资料可知，隋朝于公元586年颁历于突厥，而突厥只吸收了十二生肖记年法。未采用干支纪年法。据突厥碑文所载，突厥人是在公元730年开始使用十二生肖纪年，而在突厥之后的回鹘汗国和黠戛斯汗国，他们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当是从突厥人中延续下来。由此可以说明。赵翼关于十二生肖是由西方传入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②

以上是引用的有关资料，再加两个旁证，1、匈奴也好、突厥也好都是草原游牧民族，不可能有鸡、猪这样的动物；2、龙是汉族的图腾，不是现实中的动物。所以，根据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有关的史料考证，我们认为源于中国说比源于西方说更为有力。

关于春夏秋冬四季纪月法汉历中更是早有记载，《春秋》第一句：“隐公元年春正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县言黄龙见。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曆改年为孟夏四月。……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歲不同、至于郊祀……”

由此看来，早期的蒙古历和藏历可能受到突厥历的影响，未采用干支纪年法，只吸收了十二生肖纪年法，这其中可能也有汉语的“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不方便翻译成少数民族语的原因。不同于突厥历的是：蒙古历、藏历还吸收了汉历的春夏秋冬四季纪月法。不管是直接吸收，还是间接吸收，溯其源，十二生肖纪年法及春夏秋冬四季纪月法应该是来自于汉历。

起初只是接受了十二生肖纪年法，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藏历大约9—10世纪，蒙古历大约是16—17世纪，藏历、蒙古历形成了具有自己的特色的干支纪年法，藏历用木火土金水五行分阴阳表示十天干，蒙古用蓝红黄白黑五色各分深浅表示十天干。

于是我们可以整理出这样的脉络：藏历十一世纪，蒙古历十六世纪以前受到汉历的影响，接受了汉历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及春夏秋冬四季纪月法，十一世纪印度时轮历传入西藏后，藏历便以时轮历为主，但仍保留了十二生肖纪年，饶迥与干支并用。蒙古历接受汉历的影响比藏历多，从元代起就接受了汉族的朝代纪年法，常常是朝代与十二生肖并用，十七世纪藏传佛教进入蒙古后，蒙古历又接受了许多时轮历的内容。

这里要说明两个问题：1、历法不仅仅是纪年、纪月的表示方法，更重要的是编制法——回归年和朔望月的准确长度、安排大小月的方法、闰月的方法、日月食的测算——等，由于汉族皇帝对历法传播的严格限禁，汉历的编制法很难传入其它地区。2、蒙古历、藏历不仅接受汉历、印度时轮历的影响，也会接受其他周边国家的影响，比如，《至元译语》、《华夷译语》中的古蒙古月名，有可能受周边其他民族的影响。蒙古历、藏历中也会有自己纯民族的东西，比如：蒙古历中的成吉思汗纪年法，藏历的物候历等。

蒙古历、藏历是天文历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人文历史价值，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需要有专门的天文学、数学的知识，研究它们的横向关系更需要有多方面的语言、历史知识，这些都造成了深入涉足这个领域的难度。目前，在这个领域无论是纵向的、横向的，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都很多，我们的研究是非常肤浅、皮毛的。我们呼吁蒙古历学者、藏历学者、汉历学者大家通力合作，共同挖掘这个丰富的宝藏，精心培育这束中华文化的奇葩，使它盛开起来，传播世界。



注释

①②引文取自 <http://garden.2118.com.cn>

## Some Explanations of the Mongolian Calendar, the Tibetan Calendar and the Chinese Calendar

HUANG Ming-xin<sup>1</sup>, SHEN Xiao-ting<sup>2</sup>

(China National Library, Beijing China 100081)

**Abstract:** There are direct or indirect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of the Mongolian calendar, the Tibetan calendar and the Chinese calendar. Here we take some factual problems for examples to discuss their theories, methods and one another's influences and connections of the Mongolian calendar, the Tibetan calendar and the Chinese calendar. The present paper discusses in five parts: 1. The way of numbering years: (a) In respect of the record on the finishing date of the Mongolian book < Precious Historical Compendium of Khans' Origins >, Amtome Mstart understood it to be the 59<sup>th</sup> year after the author's birth (1662). We consider, however, that Amtome Mstart overlooked the gender of the words "killing-tü and kilintei (anger)". The word "killing-tü" with suffix of masculine gender ought to have meant the 59<sup>th</sup> year of the rab-vbyung of Time-cycle Calendar, equivalent to 1685 A.D. (b) The record inscribed in < Precious Historical Compendium of Khans' Origins > regarding Tibetan chieftain Srong-btsan-gam-po's birth year notes: "Since former uu rat year, 2750 years have elapsed till ding ox year.>. We consider that the "uu rat year" should be the next year of 2134 B.C.-the ding hog year when Sakyamuni died, which is confirmed by Saskya schism of Tibetan Buddhism. Hence, we get to know this ding ox year is 617 A.D. 2. The way of numbering months: The question arises why the first month every year of the Tibetan almanac is not designated the beginning, but the third of Hor (Mongol) months. In the paper it is indicated that it is because a year of Time-cycle Calendar begins with vernal equinox and at that time when Time-cycle Calendar new established its vernal equinox falls in the third month of the Hor month. In addition, we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ason for the appellation of Hor month and its relations to the Chinese calendar and the Indian Time-cycle Calendar. 3. The way of numbering days: There are two date records of symbolic animals in the Mongolian book <Biography of Altan Khan>. They do not match the Earthly Branches of the Chinese calendar. It is, in our view, because those dates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lunar days of Time-cycle Calendar. 4. Introduction of the Time Constitution Calendar: The Indian Time-cycle Calendar had already been introduced into Tibet in the 11<sup>th</sup> century. However, the Chinese Time Constitution Calendar, which originated in astronomy of the 16<sup>th</sup> century Europe, had not been rendered, through its Mongolian version, into Tibetan until the 18<sup>th</sup> century. It was then simplified by a Mongolian lama of Beijing Yonghegong Temple and recorded in Tibetan. In this way it became the current Tibetan Time Constitution Calendar. 5. Some researches into the sources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Mongolian calendars: Earlier Tibetan and Mongolian calendars may have been subject to influences of the Tujue calendar, as evidenced by the fact that they had not adopted the mode of numbering years by the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but by the 12 symbolic animals. The mode of numbering years by 12 symbolic animals in Tujue, however, was also transmitted from Chinese regions. Likewise, the mode of arranging months by four seasons of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originated from the Chinese calendar.

**Key word:** Mongolian calendar; Tibetan calendar; Chinese calendar; discusses

**收稿日期:** 2005-3-18;

**作者简介:** 1. 黄明信(1917-), 男, 汉族, 湖北人。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民族语文组研究馆员, 主要研究藏历和藏族佛教文化; 申晓亭(1948-), 女, 汉族, 北京人。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民族语文组研究馆员, 主要研究蒙古文文献及有关蒙古学领域。